

「兄弟鬩於牆」

同盟會成立後，在其內部曾發生嚴重的分歧，出現過「倒孫」的風潮。這種分歧是怎樣發生的？矛盾的產生應歸罪於誰呢？過去學人曾有過探討和爭論，⁸⁵茲予以綜述之。

一、首次「倒孫」風潮

在一九〇八至一九一〇年間，同盟會和孫中山都處於最困難的低潮時期。既有在西南邊境的軍事行動頻遭失敗，又發生同盟會內部的矛盾，日益加劇，上層發生了嚴重的分裂，使艱難的革命之旅雪上加霜，進一步增加了艱辛險阻。

同盟會本來就是一個鬆散的聯盟。一九〇五年，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等革命團體共同組成同盟會，實現了各派反滿力量的聯合。但是，參加同盟會的人，並不是都同意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有的人僅僅熱衷於「排滿」，有的人則只是醉心於民主共和國的理想；在武裝起

⁸⁵ 參見章開沅：《論同盟會的性質及其內部分歧》、楊天右、王學莊：《同盟會的分裂與光復會的重建》、方志欽：《析同盟會的衰亡》和吳劍傑：《論同盟會的內部矛盾及其分化》等文。

義的策略上，也有所謂「中央（北京）革命」、「地方革命」、「邊地（沿海、邊疆）革命」和「中部（長江流域）革命」的不同主張；並對孫中山的起義活動偏重廣東卻勞而無功產生質疑。此外，同盟會成立之前的小團體的和地域的界限，依然影響著一部分人。這樣，在一些問題上自然的會出現種種分歧。猶如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同盟會本部所發表的宣言中所說的那樣，在它的內部「意見不相統屬，議論歧為萬途」的現象十分嚴重。政治、思想、策略上的分歧的惡性發展，必然導致組織上的渙散和分裂。一九〇七年夏，同盟會發生嚴重分裂是必然的結果。

在漫長的革命進程中，總難免有光明與陰暗兩面，予以如實的闡釋，會給人以啟示和借鑒。歷史上的政治鬥爭不乏借題發揮的例子，「倒孫」風潮可以說也是如此。它藉助於個別具體問題爆發出來，其中隱藏的是深刻的思想分歧。這次促使同盟會分裂的導火線是孫中山離開日本時所接受日本政府和商人的一筆捐款。

早在一九〇七年初，孫中山與黃興曾因國旗圖式問題發生爭執。孫中山主張沿用興中會的青天白日旗，黃興則認為青天白日旗與日本旗相近，「有日本並華之象」，必須迅速毀棄。爭論中，黃興堅持毀棄青天白日旗的主張使孫中山很激動，他厲聲說：「僕在南洋，托命於是旗者數萬人，欲毀之，先擯僕可也。」這樣，黃興也因而激動起來，他發誓要退出同盟會。

情感衝動常常使人走向歧途。冷靜下來之後，黃興接受了孫中山的方案，他致書胡漢民說：「余今為黨與大局，已勉強從先生意耳！」

儘管國旗風波沒有使孫、黃關係破裂，但是，卻在孫中山和宋教仁之間留下了陰影。宋教仁本來就認為孫中山「待人做事，近於專制跋扈」，當他得知此事後，就更增加了不滿，從而萌發了「早自為計」的念頭。三月一日，他向孫中山辭去了同盟會庶務幹事一職。二十三日，偕白逾桓等離開東京赴奉天運動綠林武裝。

對孫中山的不滿使宋教仁以後一度加入了「倒孫」的行列中，但在當時，還僅限於兩人間；去奉天之後，宋教仁仍然使用中國同盟會孫文、黃興的名義進行活動。因此，在同盟會的內部矛盾中，國旗圖式問題只是一個小序曲。

對同盟會分裂具有決定意義的事件，是孫中山接受日本政府和商人的贈款問題。

清朝政府鎮壓了萍、瀏、醴起義之後，感到對革命力量不可忽視，追尋「禍本」，認為出於流亡在日本的孫中山，因此，通過駐日公使楊樞等出面交涉，要求日本政府逮捕並引渡孫中山。日本西園寺內閣對此採取了兩面政策，即一面向清朝政府表示同意驅逐孫中山出境，一面又力爭不得罪中國革命黨人。日本政府通過內田良平、宮崎寅藏等對孫中山說：清朝要求日本把孫中山抓起來，日本政府考慮不抓，但孫中山必須迅速離日，否則不能保證安全。同時，日本政府並資助五千元，另一日本股票商人鈴木久五郎也資助一萬元，作為孫中山離日的經費。當時，孫中山因急需一筆款子去中國南方發動起義，以便趁熱打鐵，適應萍、瀏、醴起義所帶動的革命高漲形勢，便接受了這兩筆資助。

除贈款外，日本政府還通過內田良平出面為孫中山餞行。二月二十五日，內田良平在赤

阪區三河屋設宴，應邀者有孫中山、章太炎、宋教仁、胡漢民、劉師培、汪東、宮崎寅藏、清藤幸七郎、和田三郎等人。三月四日，孫中山偕胡漢民及日人萱野長知等南下。事後數日，西園寺內閣才通知清朝政府，已經驅逐孫中山出境。清朝政府立即大肆宣揚，炫稱為外交上的勝利。

對日本政府的態度，孫中山是滿意的。他覺得：「各國政策無論如何文明，其對於與國必重於對民黨，但日本政府兩方面皆存好意，庶幾平等相待」，「殷勤備至」。⁸⁶他完全沒有想到，此事卻在同盟會中激起了巨大的風波。

鈴木小久五郎資助萬元一事章太炎是知道的，孫中山曾從中提取二千元交章太炎作為《民報》經費，章太炎嫌少，認為一萬元應全部留下，但對日本政府資助五千元一事，章太炎等則一無所知。孫中山離日後，這一情況為參加同盟會的日本人平山周、北一輝、和田三郎等探悉，首先和仲介人宮崎寅藏等吵了起來。接著，張繼、章太炎、劉師培、譚人風、田桐等也得知了這一情況，並傳聞孫中山臨行時的宴會就是一去不復返的保證，云云。張繼等認為孫中山「受賄」，「被收買」，「有損同盟會的威信」，便鬧了起來。張繼破口大罵，聲言「革命之前，必先革革命黨之命」。⁸⁷章太炎把掛在《民報》社的孫中山照片撕下來，批上「賣《民報》之孫文應即撤去」等字。他以為孫中山在香港，便把照片和批語寄去，以羞辱孫中山。

86 (日)北一輝：《支那革命外史》，東京，昭和十五年改訂六版，第四十八頁。

87 (日)北一輝：《支那革命外史》，東京，昭和十五年改訂六版，第四十八頁。

可能為此事他還寫過聲討性的檄文。剛到日本不久的劉師培也同聲附和。他們一致要求罷免孫中山的同盟會總理職務。

在這一事件中，北一輝起了挑撥和擴大矛盾的作用。他原是日本新潟佐渡地方一個釀酒業主的兒子，因家庭破產而傾向於當時流行的社會主義思潮。一九〇六年出版《國體論及純正社會主義》一書。同年十一月加入宮崎寅藏、和田三郎等組成的《革命評論》社。不久，又經宮崎介紹，加入同盟會。他認為孫中山是西歐主義者，因而，憎惡孫中山，接近章太炎、宋教仁等人。在其所著《支那革命外史》一書中，他自述說：「當時所發生之內訌，諸友皆以發生於不肖入黨數月之後，因而歸罪於不肖之行動。然而不肖方以彼等各自之色彩逐步趨向鮮明為快，深希彼等各自貫徹其思想之所向，因此敢於置不肖一身之毀譽於不顧也。」從這段敘述不難看出，北一輝當時並不以同盟會的團結為重，而是強烈期望分歧加大。他又說：「以孫君英美化之超國家觀視之，當其被逐時，日本政府贈予之數千金，未嘗不可視為對亡命客所給予之國際憐憫，然以太炎國粹主義之自尊心視之，則深以孫君率留學生離去而不示威為憾，且認為孫君實不應密收金錢，如喪家狗之被逐，太炎之所以逼使孫君辭去總理之理由，亦可使人理解者也。」《支那革命外史》一書寫於一九一四年，雖然事隔已久，偏袒章太炎等人的感情仍然很強烈。

平心而論，雙方都有其不當之處。

從孫中山一方看，他對西園寺內閣的兩面政策缺乏認識，這是事實。但是，當時中國革

命黨人以日本為活動基地，日本政府並未採取明顯的敵視態度，因此，自然不應採取率領留學生「示威」一類輕率的做法。孫中山處理不當的地方是：在接受日本政府贈款問題上沒有和大家商量，並說明有關情況。

從張繼等一方看，他們反對孫中山接受西園寺內閣的贈款可能不無道理，但是，孫中山接受贈款是為了南下起義，他們視此為「受賄」是錯誤的；由此大吵大鬧，提出革孫中山的命，要求撤換其總理職務尤其錯誤。章太炎的做法更是一種人身侮辱，是只圖一時痛快，不顧後果，嚴重傷害同志關係的行為。

屋漏偏逢連夜雨。當東京的「倒孫」風潮正鬧得沸沸揚揚的時候，又傳來了黃岡及其回應者七女湖起義失敗的消息。這是孫中山離日後領導的第一次軍事行動，它的失敗使同盟會的內部矛盾猶如火上加油，反對孫中山的人日益增多。張繼等催逼同盟會庶務幹事劉揆一召集大會，罷免孫中山，改選黃興為總理。劉揆一認為孫中山接受贈款是為了供應黃岡、七女湖起義急需。當時，孫、黃二人正籌畫於廣東發動新的起義，「萬一因總理二字而有誤會，使黨軍前途，頓生阻力，非獨陷害孫黃二公，實不啻全體黨員之自殺」，⁸⁸因此，力排眾議。張繼於盛怒之下，和劉揆一扭打了起來。與此同時，劉師培則進一步要求改組同盟會本部。他自己想當同盟會領導人，並企圖援引北一輝與和田三郎為本部幹事，也遭到劉揆一的拒絕，

因此，北一輝也對劉揆一動了武。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同年六月十七日，為籌備在廣東欽、廉二府同時起義，孫中山派萱野長知赴日購械。在宮崎寅藏協助下，共購得村田式快槍二千支，每支帶彈六百發，計畫運至白龍港起岸，供革命軍使用。村田式在日本已經落後，在中國尚不失為先進武器。但章太炎卻認為不能使用，吵吵嚷嚷地說：「這種式子在日本老早不用了，用到中國去不是使同志白白地丟了性命嗎？可見得孫某實在不是道理，我們要破壞它！」⁸⁹當時，宋教仁已被張繼從奉天叫回東京，他支持章太炎，並聯絡了同盟會本部的一些人，以《民報》社名義用明碼打電報給香港《中國日報》，說是「械劣難用，請停止另購」。因而，購械計畫擱淺。

在倒孫風潮中，陶成章支持張繼、章太炎等。據當時人回憶說：「其時黨人購買槍械靠日本浪人介紹代購」，「章太炎先生與陶公均主寧可少購，購必精良」，「而孫黃二公但求其多而價廉，認為械多可張大聲勢」，「陶於爭論時堅持尤力，因與孫黃失和。我彼時耳聞其事，曾於日比穀昌口醫院訪陶時有『大家不要爭奪領袖』的話，陶聞言即謂：『年輕人不要胡說』，但言詞之中卻嫌孫先生武斷」。⁹⁰這裡所說的「爭奪領袖」雖被陶成章斥為「胡說」，但印證了以上所引其他史實。

倒孫風潮中支持張繼、章太炎等的還有譚人風、田桐、白逾桓等，但他們的表現不那樣

89 張永福：《南洋與創立民國》，中華書局一九三三年版，第八十一頁。

90 許軹民：《從陶成章先生被害說起》，《上海文史資料選輯》第四輯，油印本。

突出，以後的表現也不盡相同。

欽、廉起義由孫中山親自策劃。他聯絡了當地抗捐的民團，聯絡了在清軍中任職的同盟會員趙聲和郭人漳，並派黃興和王和順歸國領導，原以為只要武器一到，立即可以組成一支「聲勢甚大」的軍隊，然後收兩廣，出長江，會合南京、武昌的新軍，形成破竹之勢，「革命可收完全之效果矣」。⁹¹及至王和順攻克防城，武器不到，孫中山自覺失信於起義同志和當地團紳，極為惱火，便由胡漢民出面致函同盟會本部，「力責之」，表示要執行黨中紀律。不久，又派林文（即林時壘）回東京，禁制章太炎和宋教仁，令其以後不得再干預軍事問題。九月，孫中山致函宮崎寅藏，譴責平山周、北一輝、和田三郎等「不顧公義」、「破壞團體」、「侵入內部，幾致全域為之瓦解」。他將運動日本各方面的任務交給了宮崎寅藏一人，表示「不特平山、北、和田數子，不可使之聞知」，連同盟會本部及《民報》社中人，亦不必與之商議。在同盟會的內部分歧中，北一輝等起了十分惡劣的作用，孫中山完全應該採取斷然措施，但是，專任宮崎寅藏一人，卻危險地表現了拋開同盟會本部和《民報》社的意向。

由於東京同盟會本部的混亂狀態日益嚴重，劉揆一寫信告知黃興，又寫信給馮自由、胡漢民，引用「萬方有罪，罪在一人」的譬語，要求馮、胡勸孫中山向東京同盟會本部引咎謝罪。對此，孫中山覆函謂：「黨內糾紛，惟事實足以解決，無引咎之理由可言。」他表示可以辭

91 黃季陸：《總理全集》中冊，成都近芬書屋一九四四年版，第六十八頁。

去總理一職，但必須在同盟會本部及章太炎承認不是之時。劉揆一要孫中山「引咎」，意在以孫中山的高姿態來平息越來越盛的倒孫風潮，但這是一種息事寧人的糊塗做法，孫中山對此表示拒絕是正確的。但是，他並沒有及時採取積極措施來增強團結，而是等待「事實」的解決，要求同盟會本部及章太炎「承認不是」，這就不僅將分歧的種子保留了下來，而且以感情代替了理智。

在孫中山覆函劉揆一的同時，黃興也覆函稱：「革命為黨員生死問題，而非個人名位問題。孫總理德高望重，諸君如求革命得有成功，乞勿誤會而傾心擁護，且免陷興於不義。」孫中山是當時中國革命民主派的一面旗幟，黃興以其正確態度維護了孫中山的威信，也維護了同盟會的團結。但是，他也沒有做更多的工作來消除矛盾。

由於黃興拒絕出任同盟會總理，東京的倒孫風潮暫時平息下來了，但裂痕並沒有彌合，雙方的對立情緒仍然存在。這年七月六日，徐錫麟在安慶發動起義失敗，清吏在審訊時間及行刺是否為孫文指使，徐錫麟答道：「我與孫文宗旨不合，他亦不配使我行刺。」⁹²在光復會併入同盟會後，徐錫麟始終拒絕加入同盟會，他與孫中山「宗旨不合」的情況早已存在，但是，「不配使我行刺」云云，顯然是由於倒孫風潮的影響。它反映了光復會領導人對孫中山遠非一般的不滿。

92 《徐錫麟供》，陶成章：《浙案紀略》下卷，《辛亥革命》（三），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八十一頁。

倒孫風潮的主力是張繼、章太炎、劉師培、陶成章，他們當時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日本社會主義運動中正在流行的無政府主義思潮的影響。

關於無政府主義派別出現的概況是：二十世紀初年，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中佔優勢地位的是第二國際的右傾機會主義和「左」的無政府主義，日本的情況也是如此。當時，日本已進入帝國主義階段，資本主義社會的固有矛盾充分表現出來，罷工鬥爭高漲，社會主義運動處於活躍階段。一九〇一年，在片山潛領導下，建立了社會民主黨。一九〇三年，幸德秋水組織平民社，宣傳「平民主義、社會主義、和平主義」，翻譯出版了《共產黨宣言》。一九〇六年，社會民主黨以社會黨的名義重新建立。但是，這一時期，日本社會主義運動還很幼稚。片山潛說：「儘管在我們中間對於馬克思主義進行了熱烈的爭辯和討論，儘管我們翻譯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系列經典著作，但是我們仍然處於一團混亂的狀態之中，不善於理解馬克思主義，在我們中間占統治地位的是馬克思主義改良主義和無政府工團主義的稀奇古怪的雜拌。」⁹³一九〇七年，日本社會黨分裂為軟硬兩派。軟派以片山潛、田添鐵二為代表，在第二國際機會主義影響下，主張通過議會道路來實現革命；硬派以幸德秋水、堺利彥、山川均、大杉榮為代表，完全否定議會鬥爭，宣揚無政府主義，主張除「直接行動」——總同盟罷工外，

93 片山潛：《論馬克思主義在日本的發展》，《共產國際》七—八期，一九三三年俄文版，第八十四頁。

別無其他革命的途徑。前者組織社會主義研究會，後者組織金曜（星期五）講演會。

日本社會黨開始分裂後不久，張繼、章太炎等便和硬派發生了接觸並接受了其影響。

一九〇六年，張繼根據幸德秋水的日譯本，轉譯了馬拉跌士達的《無政府主義》一書，成為無政府主義的狂熱信徒。一九〇七年春，他和章太炎通過北一輝的關係結識了幸德秋水，深受影響。在幸德秋水的遺物中，保存有章太炎、張繼一封求教的手札，中云：「明日午後一時，往貴宅敬聆雅教，乞先生勿棄。三月二十六日。」此後，雙方來往日益密切。陶冶公回憶說：「（我們）參加了日本原始社會主義者幸德秋水為首組織的座談會」，「經常以旅行玩山游水為名，到東京郊外一些地方秘密開會」。不僅如此，幸德秋水等有時還深入中國留學生宿舍，大談特談巴枯寧和克魯泡特金的學說。這樣，在中國留日學生和革命者中，就逐漸形成了一個傾向無政府主義的派別。對於這一派別，幸德秋水描述說：「亡命的革命黨中多數青年，則已不滿足於以往搞的驅逐韃虜，復我中華，創立憲政，創立共和政體等運動，而進一步主張民生主義，即社會主義，其中最進步的人則熱心宣導共產的無政府主義或個人的無政府主義，把幾萬冊雜誌、小冊子陸續秘密輸入其國內」，「對於當前的國會、選舉、商業、經濟，都根本不信任，他們對當前的政治組織和社會組織都表示絕望，而另外要謀求人民幸福之途」。⁹⁴

一九〇七年四月，幸德秋水在《平民新聞》上撰文，提倡中國的革命家與日本的革命家攜手，東洋各國的社會黨應當聯合起來。章太炎首先回應幸德秋水的倡議，開始與印度流亡在東京的革命者籌組亞洲和親會。和親會以「反抗帝國主義，期使亞洲已失主權之民族各得獨立」為宗旨，主張凡亞洲人，無論民族主義、共和主義、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皆可入會。中國方面參加者有章太炎、張繼、劉師培、何震、蘇曼殊、陳獨秀等數十人，日本方面參加者有幸德秋水、山川均、大杉榮等。和親會約章表現了某些無政府主義的影響，例如它規定「無會長、幹事之職，各會員皆有平均利權」，這正是無政府主義者反對一切「在上之人」的傳統主張。六月，劉師培通過他的妻子何震出面創辦《天義報》，聲稱其宗旨在於「破壞固有之社會，顛覆現今一切之政府，抵抗一切之強權，以實行人類完全之平等」。同月，正當倒孫風潮大起的時候，張繼和劉師培共同發發組織「社會主義講習會」，其廣告稱：「近日以來，社會主義盛於歐美，蔓延於日本，而中國學者則鮮聞其說，雖有志之士知倡民族主義，然僅辨種族之異同，不復計民生之休戚，即使光復之說果見實行，亦恐以暴易暴，不知其非」，因此，他們要研究「社會主義」。這份廣告實際上是別樹一幟的宣言書，它應是劉師培改組同盟會本部的要求遭到拒絕之後的產物。經過兩個多月的籌備，「社會主義講習會」於八月三十一日召開成立會。會上，劉師培表明了和孫中山完全不同的政治綱領。他宣稱：「吾輩之宗旨，不僅以實行社會主義為止，乃以無政府為目的」，「吾輩之意，惟欲於滿洲政府顛覆後，即行無政府。」據他說，如果「排滿以後另立新政府」，那就「勢必舉歐美、日本之偽文明推行於中

國」，其結果必將是「中國人民愈無自由，愈無幸福，較之今日，尤為苦困」。⁹⁵「建立民國」是孫中山為同盟會規定的重要任務，劉師培這裡所指責的「排滿以後另立新政府」，顯然針對孫中山和同盟會而言。它表明，劉師培等決心和孫中山分道揚鑣了。幸德秋水參加了成立會，在演說中，他聲言社會主義運動中有兩派，「平和派屬馬克思，激烈派則屬巴枯寧」；又表示：「中日兩國，地域相近」，「兩國國民，均可互相扶助」，「以促無政府主義之實行」。⁹⁶最初，「社會主義講習會」每星期活動一次，後來改為每月活動兩次。在講習會上發表演說的，中國方面有張繼、劉師培、章太炎、陶成章、何震、汪公權、景定成、喬義生等；日本方面有幸德秋水、堺利彥、山川均、大杉榮、宮崎寅藏等。

章太炎是講習會的積極分子，曾先後作過《國家論》、《人之根性惡》等講演。一九〇七年十二月，又曾提議派張繼去青島舉辦講習會。當時，山東同盟會員邀請章太炎等派人去青島辦學，章回信說：「鄙意學堂不當驟辦，蓋此事既須經費，講師又不易求，不如專在學會講社會主義為妙，溥泉可至青島一游，與同人開講社會主義一兩禮拜。」⁹⁷《致陳幹書》，章太炎佚稿。張繼所講的「社會主義」，當然是無政府主義。同一時期，章太炎在為張繼所譯《無政府主義》一書的序言中也說：「若能循齊物之妙義，任夔軋之各適，一人百族，勢不相侵，

95 《社會主義講習會第一次開會記事》，《天義》第六卷。

96 《幸德秋水演說詞》，《新世紀》第二十五號。

97 《致陳幹書》章太炎佚稿。

井上食李之夫，犬儒裸形之學，曠絕人間，老死自得，無宜強相陵逼，引入區中，庶幾吹萬不同，使其自己，斯蓋馬氏所未逮歟？」章太炎這裡所說的「馬氏」，就是義大利老無政府主義者馬拉跌士達。在章太炎看來，無政府主義雖然趕不上莊子的《齊物論》，但它還是實現人類平等，救護貧民的好藥方：「然其批搗政家，鋤犁駟僮，振泰風以播塵埃，鼓雷霆以破積堅，墮高堙卑，邱夷淵實，蕩復滿盈之器，大庇無告之民，豈弟首途，必自茲始。雖有大智，孰能異其說耶？諒知大戟薨花，是時為帝者也。」

章太炎之外，陶成章也是講習會的積極分子。魏蘭《陶煥卿先生行述》記載說：「（丁未）冬，在清風亭，偕張繼等演說，提倡社會主義。」這裡所說的清風亭，正是社會主義講習會集會的常用地點。

社會主義講習會介紹過馬克思主義。他們翻譯過《共產黨宣言》，劉師培還為中譯本寫了個序。他稱馬克思主義關於階級鬥爭的理論為「不易之說」，「與達爾文發現生物學，其功不殊」。但是，劉師培認為，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性又遠遠不夠。其一，馬克思主義不排斥作為手段之一的議會鬥爭，這在他看來，就是導致第二國際「利用國會政策，陷身卑猥」的根由。其二，馬克思主義主張無產階級在推翻了舊制度之後，還必須建立自己的國家，這在他看來，就是使人還要成為國家的奴隸，「均背於平等之旨」。

「社會主義講習會」推崇蒲魯東、巴枯寧、施蒂納爾、克魯泡特金等無政府主義者的思想，也推崇極端仇視資本主義文明、「否定政治」的托爾斯泰主義。

在他們看來，巴枯寧堪稱「近世之英傑」，施蒂納爾的學說「最為高尚」，克魯泡特金的學說「最為圓滿」，「悉以科學為根據」。托爾斯泰主義被稱為「消極無政府主義」，「足箴中國新黨之迷」。他們不要政府，不要國家，不要政治，不要軍隊，不要法律，幻想建立一個「完全平等」的人類社會。

章太炎의思想和劉師培等略有不同。他認為不能立即廢除一切政府，而必須設新政府以爲「無政府之階」，同時，他又認為不能以「無政府」爲最高理想，而應該「高蹈」盡善盡美的「太虛」，即除「無政府」之外，還要「無聚落，無人類，無眾生，無世界」。在章太炎這一時期的思想裡，無政府主義和佛教虛無主義是密切結合著的。

小資產階級不可能正確地理解和接受科學社會主義。二十世紀初年，中國近代工業還很微弱，無產階級還處在幼年階段，「社會主義講習會」諸人接觸到了馬克思主義，但卻拒絕接受，有其歷史必然性。

如果連馬克思主義都還被認爲革命性不夠，那麼孫中山的革命民主主義綱領當然就更不在話下。「社會主義講習會」諸人和孫中山在一系列問題上存在著分歧。它們分別是：

一、在對帝國主義的態度上。孫中山民族主義思想的主要矛頭指向對外賣國投降的清朝政府，它包含有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愛國主義內容。但是無可否認，孫中山對帝國主義存有某種幻想。他長年奔走於世界各地，固然是爲了發動華僑，但也是爲了爭取帝國主義國家的援助。《民報》六大主義即要求「世界列國贊成中國之革新事業」。對於日本政府，他尤其寄予

希望。章太炎等人則強烈反對帝國主義。他們認為，帝國主義絕不可能贊助中國革命，也反對向帝國主義國家爭取任何形式的援助。對《民報》六大主義中的上述條文，章太炎解釋道：「此本含混言之，要之列國政府必不贊成。」他聲言：「借援強國，冀以自全，在品格則為下劣，在事實則無秋毫之效。」孫中山接受日本政府贈款一事之所以使章太炎等那樣激動，其原因蓋在於此。

應該承認，在對帝國主義本質的認識上，章太炎等優於孫中山，但是，他們不懂得帝國主義國家之間存在著錯綜複雜的矛盾，由於這種矛盾，他們的對華政策（包括對中國革命的態度）並不完全相同，在不喪失原則的條件下，革命黨人並非不可以接受某些帝國主義國家某種形式的「援助」或「支持」。

二、在對民主立憲的態度上。孫中山指摘中國數千年來的君主專制政體，主張通過「政治革命」以建立「民主立憲政體」。《同盟會宣言》規定：「由平民革命以建國民政府，凡為國民皆平等以有參政權。大總統由國民共舉。議會以國民公舉之議員構成之，制定中華民國憲法，人人共守。」這是孫中山民權主義思想最完整的表述。孫中山認為這種政體於中國「最為相宜」。

「社會主義講習會」諸人則不然。他們不僅反對君主立憲，而且也反對民主立憲。章太炎說：「政府之可鄙厭，寧獨專制，雖民主立憲猶將撥而去之。借令死者有知，當操金椎以趨塚墓下，見拿破崙、華盛頓則敲其頭矣！」在「社會主義講習會」上，他大聲疾呼：「無論

君主立憲，民主立憲，均一無可采。」陶成章也說：「況且立憲實在是有弊病，無論什麼君主立憲、共和立憲，總不免於少數人的私意，平民依舊吃苦。」在當時，他們尤為激烈地反對代議制度，章太炎指責議院為國家「誘惑愚民而鉗制其口」的工具，把「議士」和政府、官吏一起視為「天下之最下流者」，劉師培則指責議會政策為萬惡之源，認為「凡以議會政策為目的者，無論出何黨派，決無有利平民之一日」。

二十世紀初年，歐美、日本等資本主義國家議會選舉制度弊端百出，資產階級民主已經充分暴露了它的虛偽性，「社會主義講習會」諸人看到了這一點，但是，他們不瞭解，資產階級民主比之封建專制制度來，仍然是個大進步。

三、在土地問題上。孫中山看到了歐美資本主義發展所形成的貧富懸殊現象，因此，在民族主義、民權主義之外，特別提出了民生主義。孫中山民生主義的核心是「平均地權」，即由國家核定地價，現有的地價歸原主所有，革命後因社會進步所增加的地價歸國家所有，「為國民所共用」，《民報》稱之為「土地國有」。孫中山主觀上企圖以此來防止資本主義發展所產生的弊端，而實際上，它只限制了地主階級對土地價格的壟斷，使土地買賣更適合於資本主義發展的需要。因此，列寧曾稱之為「純粹資本主義的、十足資本主義的土地綱領」。

《民報》時期，孫中山還沒有提出「節制資本」的口號，但《同盟會宣言》中有一「敢有壟斷以制國民之生命者，與眾棄之」一語，《民報》在和《新民叢報》辯論時，曾特別指出，國民經濟命脈不能「歸一二私人所壟斷」，要求將郵政、電線、鐵道、銀行、輪船、煙草、糖酒

諸事業收歸國家所有。可見，孫中山等反對的是壟斷資本主義，而不是一切資本主義。

和孫中山的「平均地權」思想不同，章太炎主張「均配土田，使耕者不為傭奴」；陶成章主張「把田地改作大家公有財產，也不准富豪們霸佔」，劉師培則主張通過「農人革命」以沒收地主的土地，按口均分，「使人人之田，均有定額」。他尖銳地抨擊同盟會的「土地財產國有之說」，指摘其為「名曰均財，實則易為政府所利用。觀於漢武、王莽之所也。則今之欲設政府又以平均地權愚民者，均漢武、王莽之流也」。從無政府主義的立場出發，劉師培反對任何政權機構來干預土地問題，而主張訴諸農民群眾完全自發的行動。

劉師培等主張把土地分給農民，這自然較孫中山和同盟會為急進，但其目的在於維護小私有制和小農經濟。他們反對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和近代工業。劉師培主張「殺盡資本家」，稱實業為「民生之蠹」。據他說：工業日進，機械日新，那麼，小民的生活也就愈加困難。章太炎認為，小艇如果可乘，就不必去造輪艦；躬耕如果可以足食，就不必去搞什麼機械。在「社會主義講習會」上，他甚至公然主張人類倒退回去學猴子，「擬猿可也」。

四、在革命策略上，孫中山主張發動會黨、新軍以進行武裝起義。一八九五年，孫中山即在廣州舉行了武裝反清的最初嘗試。一九〇六年之後，他又積極籌備在廣東、廣西、雲南等省邊境發動起義。整個辛亥革命準備時期，在以武裝鬥爭推翻清朝政府這一點上，孫中山始終堅定如一。

劉師培等反對孫中山的武裝起義路線。一九〇七年，張繼譯出了德國無政府主義者羅列

的《總同盟罷工》，該書提倡「非軍備主義」，主張以「直接行動」——全社會的總同盟罷工作為「工人階級反抗掠奪者的不二法門」。劉師培、章太炎均曾為之作序。劉序認為，如果羅列的策略能夠在中國推行起來，就會出現「握政之人，喪其所依」的局面，革命就大功告成了。他批評孫中山發動會黨以進行武裝起義的策略為「罔恤民勞」。章序的觀點與劉序大體相近。他天真地設想：只要全體勞動者發動起來，「一市之間，閉門七日」，那麼，不僅統治者的「饋餉役使」無人供給，而且連軍隊也將無法發揮作用，「雖有利器，且縮不前」了。這一時期，在東京的一些集會上，章太炎、劉師培、張繼三人曾密切配合，多次宣揚過總同盟罷工。例如一九〇七年十一月，留日中國學生因收回蘇杭甬路權事在東京集會，即首由章太炎建議運動省城罷市、罷工，次由劉師培聲稱「惟罷市、罷工尚為有益」，末由張繼「申明無政府主義罷工之說」。

在「社會主義講習會」諸人中，陶成章這一時期是主張武裝起義的，但和孫中山在南方邊境發動不同，他主張在浙江、江蘇、安徽、福建、江西一帶發動。為此，他於一九〇八年春夏間積極組織五省革命協會。

雙方在思想觀點和鬥爭策略方面的分歧大體如上，這些分歧也是導致同盟會分裂的真正原因。關於此，日本人竹內善朔說：「到了明治四十年（一九〇七年），張繼、劉光漢⁹⁸（當

98 劉光漢，即劉師培。

時都在二十四五歲左右）等優秀青年才受到社會思想的刺激，因而改變了過去指望通過『大陸浪人』取得日本朝野較著聲望的政治家們對中國革命提供援助的那種想法，轉而希望自己去掌握科學的、哲學的、條理清楚的革命原理，用以喚起人民大眾的覺醒。據我看來，他們正是為了實現這個目的才開始面向社會主義。換言之，不依靠外力而要自力更生的這種願望促使他們開始了社會主義的研究。而恰恰在這一點上，恐怕正是孫文和章炳麟及其他青年革命黨員之間發生裂痕的原因所在。北一輝寫的《支那革命外史》一書中也曾提到，這大概是明治四十年孫逸仙從日本政府某機關得到五千日元（當時我們聽說是犬養毅派人從中斡旋的）後離開日本的原因。《民報》社的人們都指責這件事，說孫文被收買了；其實，我們當時都有這樣一種感覺；孫文看來，對於當時留日青年中的這種思想變化情況，繼續在日本待下去也已無能為力了。因此可以說，當時的社會主義思想研究在一部分中國同志之間構成了發生內訌的原因。如果這種看法是對的話，這和日本社會主義者之間的派別問題如出一轍。可以說，思想的成長引起了他們之間的分裂，而且其中又摻雜了感情活動。」⁹⁹ 竹內善朔是幸德派的金曜講演會成員，同盟會分裂的目擊者，他的這段回憶為我們提供了理解這一段歷史的第一手資料。

不難看出，「社會主義講習會」諸人的觀點中除謬誤的成分外，也有若干合理的成分，但

是，極端狂熱的無政府主義把它們扭曲了。

無政府主義是一種小資產階級思潮，這一階級經常在「左」和右兩極滾動。列寧指出道：小資產者，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由於「經常受到壓迫，生活往往陡然下降，所以容易激發一種極端的革命狂熱，而缺乏堅忍性、組織性、紀律性和堅定精神」。「這種革命狂熱動搖不定，華而不實」，「很快就轉為俯首聽命，消沉頹喪」。「社會主義講習會」諸人生長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親身感受到了帝國主義的壓迫，親眼看見了或聽到了日本、西歐資本主義發展所造成的各種罪惡，因此，對中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前途絕望。劉師培等認為，與其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還不如保持封建主義。劉師培聲稱：「若於政府尚存之日，則維新不如守舊，立憲不如專制」，「代議之制度，較之官吏之專制，其害尤深」。章太炎也表示，如果沒有均配土田、官立工廠、限制財產相續、解散議員等四條作為保證，那麼，「勿論君民立憲，皆不如專制之為愈」。他說：「盛唐專制之政，非不可以致理」，「今之專制，直刑罰不中為害，佗猶少病」。這就從「左」邊滾到右邊去了。

一九〇七年冬，由於悲觀失望，章太炎想到印度去做和尚。他先是通過清朝政府駐長崎領事卞昌向張之洞謀求路費，未成，又連續給短期歸國的劉師培夫婦寫過五封信，要他們和端方等聯繫。他沒有想到，劉師培夫婦這時已決計叛變革命。到上海後，劉師培立即寫信向端方自首。次年一月，張繼因參加幸德派的第二十次金曜講演會，被日本員警追捕，輾轉逃往法國。這樣，「社會主義講習會」就失去了一員幹將。其後，劉師培夫婦回到東京，改出《衡

報》，託名在澳門出版，繼續高唱無政府主義，暗中則為清朝政府做偵探。四月，章太炎與劉師培、何震、汪公權之間因事吵翻，章太炎從劉、何的住處搬回了《民報》社。六月，發表《排滿平議》，明確表示和無政府主義決裂，宣稱「無政府主義者，與中國情狀不相應，是亦無當者也」。這樣，「社會主義講習會」又失去了一員幹將。此後，劉師培夫婦逐漸受到東京中國革命黨人的冷落。在此期間，劉師培、陶成章之間也發生不和。這年十一月，劉氏夫婦回到上海。為了製造混亂，挑撥關係，將章太炎要他們和端方等聯繫的五封信影印寄給了黃興等人。黃興當時「一笑置之」，但以後引發一場軒然大波。

同盟會的內部矛盾本來就相當複雜，由於出現了劉師培之流內奸，它就更加複雜化了。

二、再次「倒孫」風潮

同盟會中無政府主義派別的出現反映出革命派內部政治上、思想上的深刻矛盾。但是，除個別人與之稍有辯駁外，並沒有形成一場是非明辨的論戰。

從孫中山一面看，他對無政府主義的破壞性認識不足。曾經有人提醒他：無政府主義「其性質與同盟會之民生主義迥殊」，但孫中山卻回答說：「無政府論之理想至為高超純潔，有類於烏托邦，但可望而不可即，頗似世上說部所談之神仙世界。吾人對於神仙，既不贊成，亦

不反對，故即以神仙視之可矣。」¹⁰⁰

從「社會主義講習會」一面看，由於張繼出走，章太炎、陶成章和劉師培之間不睦，這個派別也已處於渙散狀態，無法繼續活動，更無力從思想上、理論上對同盟會進行新的攻擊。除劉師培外，無政府主義的旗號也逐漸收了起來。

自一九〇八年下半年起，同盟會內部矛盾的焦點轉為經費問題。

章太炎等人在東京掀起的風潮嚴重地傷害了孫中山的感情，自此，他將全部心血和熱情都澆注到了南洋方面。一九〇七年八月，孫中山積極支持同盟會新加坡分會創辦《中興日報》，使之成為宣傳革命和與改良派論戰的新陣地。他不僅親自為該報撰稿，過問編輯、財務、招股等事，而且多次表示，《中興日報》的文章議論「頗愜人心」，「於大局甚為有關」，維持《中興日報》乃「吾黨在南洋之極急務」，要求南洋各地同志積極支持。

與此同時，孫中山又積極整頓南洋各地同盟會，並醞釀將它改組為中華革命黨。一九〇八年秋，他在新加坡建立同盟會南洋支部，訂立分會總章十六條及通信辦法三條，委胡漢民為支部長，統一領導南洋各地同盟會分會，以期互相聯絡，「協力相扶，同心共濟」。通訊辦法規定：各團體間至少每兩個月互相通訊一次，住址有移換時，須即時通知南洋支部，如有新團體成立，即由南洋支部發信通知。這樣，南洋支部實際上形成一個與東京總部並峙的中

心。

和南洋相反，東京同盟會總部愈來愈渙散，《民報》的問題也愈來愈多。

《民報》在歸章太炎編輯後，逐漸傾向於談國粹，說佛理。孫中山、胡漢民離日後，原主要撰稿人朱執信、汪精衛等也陸續離日，《民報》談佛理的文章逐漸增多。一九〇八年二月印行的第十九號居然以首要篇幅刊登《大乘佛緣起說》。有讀者批評其為不作「民聲」，而作「佛聲」。這種不滿當然不會是個別的，因此，銷數銳減，「印刷房飯之費，不足自資」，窘迫得開不了夥，章太炎有時就靠啃幾塊「麥餅」過日子。其後，章太炎曾寫過五六封信，打過三四次電報，呼籲南洋方面接濟，據說，「或無復音，或言南洋疲極，空無一錢，有時亦以虛語羈縻，謂當挾五六千金來東（相）助，至期則又飾以他語，先後所寄，只銀圓三百而已」。為了維持《民報》出版，陶成章準備親往南洋招股。對此，孫中山及東京部分革命黨人均加勸阻，理由是「南洋同志甚少，且多非資本家」，「必無效果」，建議在東京另籌。陶成章沒有聽取這一意見，於一九〇八年九月南行。

陶成章南行的目的有二，除為《民報》募捐外，還要為籌備中的五省革命協會募集經費。到南洋後，陶成章向孫中山要求撥款三千元作為《民報》印刷費，並要求增加股款及維持費。據有關人士回憶：「孫中山四處張羅，無法籌措，乃出其手錶等物，囑往變款，以救燃眉之急」，陶成章因此發生誤會，與孫中山「爭執不休」。此外陶成章又要求孫中山為他籌款五萬元，以便「回浙辦事」。對此，孫中山「推以近日南洋經濟恐慌，自顧不暇，斷難辦到」。陶

成章要求為他寫介紹函去各地募捐，孫中山同意了。

「南洋經濟恐慌」並非完全是孫中山的托詞。自一九〇七年黃岡之役起，至一九〇八年五月河口之役止，孫中山共在南方邊境發動了六次起義，用去近二十萬元，南洋華僑中有力捐款的同盟會員大都已成強弩之末；加上河口之役後，六七百名起義戰士被法國殖民當局解除武裝，強行押送至新加坡，再加上要解決他們的生活出路問題，經濟更加拮据。十月十六日孫中山致檀香山同志函云：「黨中財政日困，雖香港一隅，或得檀埠同志之接濟，而他方則無法可設也。」信中所言，應是事實。

由於在經費上沒有得到孫中山的積極支持，陶成章決計「獨自經營」。他制定了章程，開始以江、浙、皖、贛、閩五省革命軍決行團為名進行籌餉。章程中，陶成章特別說明：「本光復會，由來已久。乙巳夏，由總會長蔡、湖南分會長黃，從輿論眾望，請孫中山先生為會長，開會日本東京，改名同盟會，而以本會附屬之。但該時浙江內地，勢力異常擴張，章程發佈已久，更改為難，故內地暫從舊名。然重要事務員，均任同盟會職事，故又名浙江同盟會分會。」這段文字突出地誇張了光復會的作用。它絕口不提興中會，把成立在前的華興會說成是光復會的湖南分會，把光復會說成是同盟會的母體，顯然都是在為重新打出光復會旗號做準備。稍後，陶成章即積極聯絡在南洋的李燮和等人，印製會章、盟書，雕刻圖印等物，計畫發展會員，建立組織。

南洋是同盟會的根據地。從興中會起，孫中山就在南洋活動，當地華僑對同盟會是熟悉

的，光復會則還是一個陌生的名詞。因此，在一段時期內，陶成章還不得不仰仗孫中山和同盟會的威望，籌餉章程中，陶成章特別聲明「本會既為同盟會分會，故本章程訂立後，移知東京總部及南洋支部」，所得款數「亦移知東京總會及星洲分會」。但是，陶成章的募捐活動卻一直進行得很不順利。十一月，陶成章到緬甸仰光，在《光華日報》上發表記述秋瑾、徐錫麟起義的《浙案紀略》以為宣傳，臨時募得千元。十二月六日，到檳榔嶼，該地辦事人聲稱，按章程，必須孫中山本人來運動方可，僅邀集三四人，認捐三百元。一九〇七年一月二十三日，到壠羅，正值《中興日報》代表到埠演說，言「《中興報》事緊要」，並聲言：「陶君來此，不過來遊歷而已，並非籌款而來。」因此，亦僅認捐三百數十元。陶成章懷疑孫中山在「暗中設法播弄」，開始攻擊孫中山。他在與人書中說：「弟本不說中山壞事，蓋猶為團體起見，不得不稍留餘地，至是逼弟無可奈何，不得不略陳一二已。」其間，陶成章曾向孫中山索取介紹函至各地收款，被孫中山拒絕。

這以後，陶成章到爪哇，開始建立光復會組織。二月十四日致李燮和等書云：「前此寄上盟書、圖章等物，未識已收到否？念甚。此次弟又攜來二千四百張，如要用，可寫信來爪哇，弟當寄上。」不久，各地分會陸續建立。新加坡參加者有許雪秋，文島有李燮和及僑商曾連慶、蔣報禮等。許雪秋等原為同盟會會員，由於在黃岡起義失敗後群居南洋，埋怨孫中山等「招待不周」，因此，積極支持陶成章別樹一幟，並帶動了一批潮州、嘉應人加入。這樣，南洋就有了兩個並行的各成系統的組織，一個是同盟會南洋支部，一個是自稱附屬於同盟會總部的

光復會。

光復會的傳統活動地點在江、浙，陶成章在南洋樹旗活動，明顯地造成了和南洋支部爭奪群眾和影響的對壘局面。如果說，東京的倒孫風潮表現為對個人的不滿，「社會主義講習會」的建立表現為思想上的分歧，這一時期就進一步發展為組織上的對立了。

在樹旗活動後不久，陶成章又在錯誤的道路上邁出了一大步。

還在一九〇九年五月間，陶成章就在文島等地散佈流言，聲稱孫中山將各處同志捐款攫為己有，河口起義所用不過千餘元等等。九月，陶成章去到檳港，糾合李燮和、柳聘農、陳方度、胡國梁等七八人，以東京南渡分駐英、荷各屬辦事的川、廣、湘、鄂、江、浙、閩七省同志的名義起草了一份《孫文罪狀》，聲言「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惡無盡」，指責孫中山有「殘賊同志之罪狀」五條，「蒙蔽同志之罪狀」三條，「敗壞全體名譽之罪狀」四條，並表示：「惡莠不除，則嘉禾不長」，共提出要求九條，其主要者為：

- 一、開除孫文總理之名，發表罪狀，遍告海內外。
- 二、另定章程，發佈南洋各機關，令其直接東京總會。囑令南洋支部章程一概作廢。
- 三、再開《民報》機頭。
- 四、兼於《民報》社內，附設旬報，凡《中興日報》之所至，亦蹤尋之而往。

《罪狀》並誣衊孫中山在香港、上海滙豐銀行貯款二十萬；其兄在九龍起造屋宇，用款不足，孫中山電匯款項助建云云。其後，陶成章便帶著這份《罪狀》趕赴東京，要求同盟會本部開會討論。

在東京的「倒孫」風潮之後，孫中山即不大過問同盟會本部和《民報》的工作，這是事實，但是《罪狀》大部分屬於誣陷。它得到了少數江浙人的支持，卻遭到了黃興等的堅決拒絕。黃興一面向陶成章作調停、勸說，一面和譚人風、劉揆一聯名發表長達千餘言的致李燮和等公函，逐條為孫中山申辯。

黃興的調停、勸說、申辯都沒能打動陶成章。在公佈《罪狀》的要求被拒絕後，陶成章便決定自行發表。他在與人書中表示：「與中山已不兩立」，「不若由二三人出面發表之，從此分為兩歧罷了」。其後，便由陳威濤、魏蘭將《罪狀》油印百餘份，寄給了南洋各報。

革命的首要問題是分清敵我，陶成章等把孫中山視為敵人，不顧大局，不顧影響，惡意誣陷，這是一個極為嚴重的錯誤。

陶成章等的行動迅速影響了章太炎。在公佈《孫文罪狀》的同時，章太炎也刊發《偽（民報）檢舉狀》，再次參加了對孫中山的攻擊。

《民報》於一九〇八年十月遭日本政府封禁，一九〇九年秋，黃興在林文等幫助下籌備恢復。因為對章太炎主持時的《民報》不滿，黃興邀汪精衛到東京任編輯；又因避免日本政府干涉，託名以巴黎《新世紀》為發行所。

恢復《民報》本來是陶成章等在《孫文罪狀》中提出來的「善後辦法」，但是，他堅持不能替孫中山「虛張聲勢」，必須以革除其總理職務為先決條件。自然，這也遭到了黃興的拒絕。因此，他便支持章太炎出面反對。章太炎多年困苦維持《民報》，一旦恢復，卻被排斥在外，對此大動肝火。他指責續刊《民報》為偽《民報》，在《檢舉狀》中攻擊孫中山「背本忘初，見危不振」，並主觀武斷地說：「夫孫文懷挾鉅資，而用之公務者十不及一，《民報》所求補助，無過三四千金，亦竟不為籌畫，其干沒可知已。」¹⁰¹沒有任何根據，一個想當然的「可知已」就定了孫中山「干沒」鉅資的案！

對孫中山的公開誹謗為保皇派提供了炮彈。不久，《南洋總彙報》發表了《偽（民報）檢舉狀》。其後，保皇派大規模地開展了對孫中山的攻擊，各種穢詞如水般潑來。他們辱罵孫中山為「馬騙」、「棍騙」，誣衊其「假借革命名目，以為衣食飯碗之計」，說是：「孫文腔中，何嘗有一滴愛國之血，眼中何嘗有半點愛國之淚，心中何嘗有分毫愛國之思，不過口頭禪焉耳！」¹⁰²

和陶成章、章太炎相呼應，當時在法國的張繼則寫信給孫中山，要求他「退隱深山」，或「佈告天下，辭退同盟會總理」。¹⁰³這樣，就出現了第二次「倒孫」風潮。

101 轉引自《黨人》，《新世紀》第一一七號。

102 介民：《敬告捐助革命軍餉者》，加拿大《日新報》一九一一年四月二十六日。

103 轉引自孫中山《致張繼函》，吳稚暉原藏，未刊稿。

敵人的辱罵、鎮壓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同營壘人的反誣和倒戈。長期以來，孫中山把實際領導起義的責任交給了黃興等人，而在華僑中募集起義經費為己任。陶、章這兩份材料的公佈對孫中山工作所造成的困難是可想而知的。為了破壞孫中山赴美募捐，陶成章等甚至冒名作信，將攻擊材料寄發美洲各華字日報。十月二十二日孫中山與王子匡函云：「近接美洲來信，謂有人托同盟會之名，致書各埠，大加詆毀於弟，不留餘地，該處人心頗為所惑云。

此事於聯絡華僑一方面，大有阻礙矣！」但孫中山毫不灰心，一面要求吳稚暉在巴黎《新世紀》上撰寫長文，「加以公道之評判」，一面對張繼嚴正指出：「此時為革命最衰微之時，非成功興盛之候，是為弟冒艱危、茹困苦以進取之時代，非退隱之時代也。」他並憤憤地說：「同盟會及太炎至今未自認過，則弟已不承認為彼等之總理者久矣。前去兩年，兩廣、雲南起兵，皆奉革命黨本部之名義，並未一用同盟會名義也。」¹⁰⁴

經歷種種挫折而革命之志不撓，這是孫中山作為一個偉大人物的突出優點，但是，因章太炎等少數人而遷怒及於同盟會，仍然是以感情代替了理智。在很長一段時期裡，東京同盟會員處於群龍無首的狀態，國內各地同盟會分會也無人領導，在這方面，孫中山不無責任。

一九一〇年二月，孫中山在舊金山建立同盟會分會，在誓詞中將同盟會會員改稱中華革命黨黨員，開始實現其醞蓄已久的打算。同年秋，抵達檳榔嶼後，又通知南洋各地同盟會分會，

一律照改。但由於同盟會已在群眾中留下深刻的影響，事實上難以執行，不久也就作罷。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陶成章對孫中山的攻擊激起了革命黨人的義憤。東京方面，黃興等決定不和章太炎計較，只在即將續刊的《民報》上登一啟事，宣佈章太炎為「神經症之人」。他要孫中山「海量涵之」，表示「陶等雖悍，弟當以身力拒」。為了給孫中山赴美活動掃除障礙，黃興又函知美洲，指出有人從東京發函攻擊孫中山，「用心險毒，殊為可憤」，要求美洲同志乘孫中山到美機會，同心協力，以謀團體之進步，致大業之成功。

安南方面，中國革命黨人發表《河內公函》，詳述發動雲南、廣西起義的情況，針對陶成章的誹謗，一一予以駁斥。

南洋方面，革命黨人焚毀了陶、章散發的印刷品，派人調查，發現孫中山在九龍的家除幾間舊房外，別無所有；孫中山的哥哥孫眉自己蓋了草房子在那裡種地；於是，將實情公佈，真相大白。

多年來，同盟會在其內部分歧中，既無同志式的討論，又無思想上的必要交鋒。現在交鋒了，這對於澄清真相，維護孫中山的威望來說都是必要的，但是，這種交鋒無助於填平雙方感情上的巨大鴻溝。

在「倒孫」風潮的掀起者中間，劉師培的叛徒面目此時已經暴露。一九〇八年冬，劉師培回上海後即出賣了同盟會會員張恭，不久，又投入端方幕中。一九〇九年八月，端方由兩江調直隸，報上發表了隨員名單，劉師培赫然在內。在此情況下，人們不得不思考，和劉師

培一度關係極為密切的章太炎是什麼人？

他為什麼對孫中山如此攻擊不遺餘力呢？在未經冷靜分析的情況下，東京革命黨人公佈了章太炎致劉師培、何震五函，指責章太炎為端方偵探。十一月三十日，《中興日報》發表《章炳麟與劉光漢之關係歷史》及《為章炳麟叛黨事答覆投書諸君》等文。十二月，孫中山得悉保皇派報紙發表了章太炎的《偽（民報）檢舉狀》，認為章太炎「破壞黨事之心已不留餘地」，要求吳稚暉將章太炎致劉師培、何震五函的筆跡照片寄給他，「以證明太炎之所為，庶足以破其言之效力」。不久，香港《中國日報》、巴黎《新世紀》、美國《少年中國晨報》先後發表了這五封信，《中國日報》聲稱章太炎受端方委任，擔任解散革命黨及常駐東京之偵探員，《新世紀》指責章太炎以「萬金出賣一革命」。

將章氏五函的問題一下子提到如此的高度，當然也嚴重傷害了章太炎的感情。剛愎自負而又極易衝動的章太炎對此的態度是可以想像的。

在再次「倒孫」風潮中，思想分歧退居次要地位，但是，雙方的關係則由彼此猜忌、怨憎發展為互相敵視和進行勢不兩立的攻擊，分裂成為不可避免的了。

三、光復會的重建和倒退

陶成章到東京時做了兩手準備：一手是爭取黃興，開除孫中山，另推同盟會總理，掌握同盟會的領導權；另一手是取消對同盟會形式上的附屬關係，公開分裂，重建光復會山頭。

在開除孫中山的要求被拒絕之後，陶成章便按第二手行事。他多次與李燮和、胡國梁等通函，聲稱同盟會東京總會已經「一敗塗地，無可整頓」，必須「另行組織新機關」。他說：「何妨另開局面乎？前次之事，終算一場大悔氣罷了！」¹⁰⁵札在此同時，又積極爭取章太炎，以光復會成立在先來打動他，說：「逸仙難與圖事，吾輩主張光復，本在江上，事亦在同盟會先，曷分設光復會？」¹⁰⁶章太炎長期對孫中山不滿，他的性格又一向是任情孤注，不考慮利害得失，對此自然表示同意。

一九一〇年二月，光復會總部成立於日本東京，章太炎任會長，陶成章任副會長，章梓任庶務員，沈家康任書記員。由於基本群眾在爪哇等地，因此，光復會在南洋設行總部，代行東京本部職權，以李燮和、沈鈞業、魏蘭為執行員，下轄各地分會，形成了所謂「以南部為根基，推東京為主幹」的局面。

後期光復會收容了同盟會中包括原華興會內對孫中山不滿的分子，以同盟會的反對派面目出現，但是，比起同盟會，它在不少方面都倒退了。

章太炎是後期光復會中唯一的理論家。這一時期，他思想中的封建主義成分進一步向前發展。三月十日，他和陶成章在東京一起創辦《教育今語雜誌》，以「保存國故，振興學藝，提倡平民普及教育」為宗旨。《緣起》中說：「恨歐學東漸，濟濟多士，悉舍國故而新是趨」，

105 《致若愚、鐵仙》，陶成章手札，未刊稿。

106 《太炎先生自定年譜》，未刊稿。

「同人有憂之，爰設一報」，藉以「明正道，辟邪詞」。中國是個封建古國，清王朝是個實行高度封建專制主義的王朝，因此，在這一歷史條件下，「歐學」，即西方資產階級上升時期的民主主義文化，仍然可以發揮其進步作用，但是，《教育今語雜誌》卻視為「邪詞」，要「辟」。在此之前，續刊《民報》正在介紹盧梭的《民約論》，《教育今語雜誌》的出版可以說唱的是對臺戲。同年由章太炎編輯的《學林》也一樣充滿了國粹氣。該刊《緣起》說：「世人多急（利）近功，以古學不足治，惟異化之務」，它號召「一二耆儒故老」們起來挽救即將「墜入糞壤」的「文武之道」。這裡所說的「異化」，指的是鴉片戰爭以來先進的中國人向西方尋找救國真理的熱潮，所謂「文武之道」，指的是長期成為中國人民精神枷鎖的封建文化。在該刊第二期上，章太炎發表了著名的《秦政記》，歌頌「卓絕在上，不與士民等夷」的「天子」，說是「人主獨貴者，政亦獨制」。同期發表的《非黃》則抨擊「尚賢」、「任眾」的民主政治，說是「誠聽法，雖專任，與武斷莫比；誠尚賢，雖任眾，與武斷奚分？」如果說，一九〇八年章太炎發表《代議然否論》，主張「代議政體，必不如專制為善」時，還曾經特別提出了一個「恢廓民權」的方案，那麼，這一時期，他已經更多地神往於「王者一人秉權於上」的「法家封建專制主義」了。

陶成章是後期光復會的組織者和實際領導人。這一時期，他的活動逐漸向改良主義方向靠近。

前文指出，當張繼等迷信「直接行動」——總同盟罷工時，陶成章仍然主張進行武裝起義，

但是，光復會重建後，他卻拋棄了自己的主張。在《致石哥函》中，他說：「夫我輩之目的，在一舉覆清，若東放一把火，西散一盤沙，實屬有害而無益。」又說：「如不用暗殺，則用地方起兵，喪民費財，禍莫大焉！一有不慎，必引外國人之干涉，後事益難著手矣！」¹⁰⁷和人群眾缺乏充分的聯繫，實行單純的軍事冒險，這是同盟會所領導的武裝起義的弱點，但是，這些起義畢竟打擊了清朝統治，鍛煉了革命者，教育了群眾，不能稱為「有害無益」，更不能稱為「禍莫大焉」，至於所謂「必引外國人之干涉」云云，更是被革命派痛駁過的改良派謬論。

當時，國內各省革命力量迅速發展，他們武裝反清的總目標一致，只在策略上互有歧異：「有欲向雲貴以進取者，有欲向兩廣以進取者，有欲向江浙以進取者，有欲向兩湖以進取者，有欲向山東、河南以進取者，有欲向中央革命。」¹⁰⁸這本來並不難統一，對於上述各種力量，陶成章一概採取排斥態度，他說：「如此紛紛之熱心人各欲乞此總會以求運動整頓，其將奈之何哉！當是時也，不與則名不正，言不順。欲與則無款以給之，即令有稍稍之款，與其一不與其二不可也，與其先不與其後不可也，全力助他人，未見他人之能集事，本己之方針，且先亂矣。秦末之項羽，隋末之李密，其失敗皆因此也。」在陶成章看來，多一些人革命反而會造成麻煩，唯此一家最好，因此，他給光復會規定了「必不汲汲擴張」的關門主義方針。《浙案紀略》中，陶成章說：「浙人素多個人性質，少團體性質，其行事也喜獨不喜群。」這

107 陶成章手札，未刊稿。

108 《致石哥》，陶成章手札，未刊稿。

可以說是陶成章的夫子自道。

一不靠武裝起義，二不靠全國各地的革命力量，陶成章靠什麼「一舉覆清」呢？他靠的是暗殺活動。光復會重建後，他曾建議集款數千金或萬金，專辦此事，以振動華僑，擴大影響。¹⁰⁹甚至，他想入非非地提出了一個實行「中央革命」的妓院方略：收羅一批美女，在北京開設妓院，誘惑滿族親貴，席間放毒，一網打盡。

弱者和窮途窘促的人常常盼望奇跡。妓院方略的提出，說明了陶成章和同盟會分裂後，既軟弱無力，又窮途窘促。

當然，生活中出現奇跡的可能並不大，這一點，陶成章完全明白。因此，他為後期光復會規定的方針是「專主人運動，以教育為根本」，「察學生之有志者聯絡之」。據他說，如果能得到兩三個有資本的學生的贊成，就於願已足。光復會重建後，陶成章立即和章太炎編輯《教育今語雜誌》，目的在此；隨之，他在東京埋頭編寫小學歷史、地理教科書，目的也在此。一九一一年初，他又曾計畫到南洋找一個寺院住下，專力編撰教科書。《致柱哥》函云：「蓋弟近立定主意，不為虛耗金錢之事，更不為無益之舉，而虛耗其精神，實事求是，以圖漸進，不為躡等。」¹¹⁰

「虛耗金錢」、「無益之舉」云云，指的都是武裝起義，「漸進」云云，指的就是教育。「不

109 《致石哥》，陶成章手札，未刊稿。

110 《致石哥》，陶成章手札，未刊稿。

為躡等」云云，完全是改良派的爬行哲學。和劉師培、章太炎一樣，陶成章也經歷了一個從「左」到右的轉化。

反革命的暴力必須以革命的暴力去推翻。同盟會領導的武裝起義雖然存在著種種弱點，但是，歷史證明了，使清朝皇帝滾下龍座的還是武昌新軍手中的槍炮，而不是陶成章的「教育根本」論。

在經費問題上，後期光復會也逐漸效法改良派。

同盟會解決經費問題靠在華僑中募捐，這使他們在一定的範圍內還能聯繫群眾。後期光復會成立後，陶成章主張靠經商，他說：「曆觀萬事，皆與財政相為因果，然財政之道，非自行籌畫無由，此商業之所以不得不速為經營。」¹¹為此，他和李燮和等積極籌辦商業公司，計畫經營教科書籍、圖畫、科學儀器、體操、音樂用具，學校用品、衣衫、牙粉、肥皂等；並計畫把《教育今語雜誌》改變為廣告機關。¹¹²這一套，都是流亡海外的改良派的做法。

由於分裂不得人心，光復會重建後不久即在各方面陷入困境。

首先是對孫中山的攻擊不得不停下來。本來，陶成章已經編印好了《佈告同志書》一冊，「直言孫文種種之非」。由於輿論，包括光復會內部的強烈反對，僅散發了九冊，不得不宣佈「餘皆不寄了」。

111 陶成章手札殘頁，一九一〇年。

112 陶成章手札殘頁，一九一〇年。

其次是陶成章視為「吾輩面目所存」的《教育今語雜誌》停刊。陶成章原以為該刊發行後會「普及南方各地」，結果只售出了不到三百本，大部分擱置在代辦所無人問津，已銷之款又遲遲收不到，因而「虧折甚巨」，「真正困難萬分」。

再次是籌款門路均已斷絕。據陶成章說：內地可籌之處，久已籌之一空；東京萬無可籌，南洋呢？所籌之款又不見寄來，氣得他準備發表聲明，將不再向南洋各地募捐。

此外，商業活動也進行得極不順利。陶成章《致柱哥》函云：「祈老哥善自珍重，勿以經商目的之不能遽遂，多生煩懣，致生理有礙也。」

按照計畫，陶成章還準備創辦《光復報》與《光復雜誌》，但都因找不到作文之人而告吹。據陶成章說：章太炎雖有幾個弟子，但多半是為了學成後往內地當教員，「非特不肯作文，且亦不能請其作文」，其中雖有一二稍有志者，但「皆欲獨善其身」，不願意介入，章太炎本人呢？「乃其不肯作文何」！章太炎反對創辦《光復報》和《光復雜誌》。這一時期，陶、章之間也產生了某種矛盾。

革命需要團結，陶成章肆無忌憚的分裂行為使他陷入了四面楚歌中。在東京，他覺得「實在難以過日」；回南洋吧，當地同盟會員反對分裂的呼聲很高，「風潮方作，來反遭忌」。一直躊躇到一九一一年四月，他才從東京回到南洋，已經是廣州起義的前夜了。

在籌備廣州起義過程中，黃興電邀李燮和、王文慶、陳方度等參加，建議「捐除意見，同任艱巨」，主動向光復會伸出了合作之手。李燮和等積極回應。一九一〇年十月，李燮和受

檳港同志委託，參加了孫中山在檳榔嶼召集的發難會議。會後隨即回檳港傳達，動員華僑捐款。經過幾個月的努力，籌得一萬七千餘元，由李燮和、陳方度帶給了黃興。不久，胡國梁、柳聘農也帶著募得的五千元趕到香港，向統籌部報到，一起參加了震驚中外的廣州起義。

與此同時，陶成章也應李燮和、王文慶電召，到達香港，表示出和同盟會合作的意向。這樣，在經過了長期的分裂之後，同盟會、光復會矛盾重重的關係出現了轉機。但不幸的是，這一轉機很快就消失了。

廣州起義失敗後，趙聲極為悲憤。一日，胡漢民招飲，食後，趙聲腹痛劇作，延醫診治，知為盲腸炎，經割治無效，於五月十八日逝世。趙聲先是光復會員，後加入同盟會，是在雙方會員中都具有威望的革命者。對趙聲之死，陶成章疑為胡漢民所毒，進一步加深了對同盟會的猜忌。其後，陶成章回到上海，在嵩山路沈宅開會時與陳其美發生衝突，陳其美掏槍欲打陶成章。數日後，陶成章匆匆離開上海，再返南洋。於是，舊矛盾之外又加上了新矛盾，同盟會、光復會之間的關係又增添了新的複雜因素，它埋下了辛亥革命後兩會繼續摩擦、齟齬、對立的種子。

通過以上分析，不難看出，同盟會的分裂是個複雜的歷史現象，它是一系列政治、思想、策略分歧和人事糾紛發展的結果。既有其時代原因，也有其社會原因。

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發生於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社會的腐朽、醜惡的一面早已暴露無遺，在歐美和日本，擺在日程上的已經是從資產階級下面解放出來的問題。因此，在這

一情況下，必然會產生對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不滿、懷疑以至絕望的情緒。同時，中國又是個小資產階級極其廣大的國家，在國際無政府主義思潮一度抬頭的情況下，同盟會中有人受到這一思潮的影響是很自然的。中國同盟會的分裂發生於日本社會黨的分裂之後，張繼、劉師培諸人的行為不少是對後者的模仿。

「社會主義講習會」諸人在反對帝國主義、實行土地革命和不能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等問題上向同盟會提出了挑戰。由於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階級局限和其由娘肚子裡帶出來的特殊軟弱性，它無法解決這些問題。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在對改良派的論戰中已經被證明了不是很有力的理論武器；在回答「社會主義講習會」的挑戰上，當然更加發揮不了多大作用。

「社會主義講習會」諸人自身同樣也解決不了這些問題。在書面上，口頭上，他們可以連篇累牘、喋喋不休地發出極端革命的豪言壯語，沉溺於「無政府革命」的狂熱幻想，然而卻提不出任何切實可行的辦法。在嚴峻的現實面前，他們很快就會暴露出牆上蘆葦的劣根性來。其中有些人就會向右轉，倒向封建主義和改良主義，或頹唐，或倒退，或動搖，或叛變投降。

同盟會的分裂淵源於思想分歧，但是，在其發展過程中，思想分歧逐漸被掩蓋起來，個人主義、宗派主義、分散主義、行會主義和山頭主義逐漸上升，舊的感情上的裂痕和新的摩擦、猜忌、怨憎結合在一起，引發出新的攻擊。終於愈演愈烈，一發不可收拾。

克服個人主義、宗派主義等傾向需要以大局為重的廣闊胸襟和高度的組織觀念，而這對世界上任何偉大人物來說，都是比較難以做到的。因此，在研究同盟會內部風潮與孫中山的

關係問題上，就有人剖析了同盟會內部分歧與孫中山性格特徵的內在聯繫，認為孫中山性格的否定規定性明顯表現為偏激固執、我行我素等特點。由於他始終沒有清醒地認識到自身的性格特點，沒有從主觀上盡量避免自身性格特徵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因此也就一直沒有正確地、有效地建立起他在革命領導層中應有的偉岸形象。「無論對於孫中山的本人，還是整個革命事業，這都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¹¹³

同盟會內部分歧的激化和其上層出現的分裂，嚴重損害了革命黨人的威信，極大地損害了革命團體的內部和諧，進而分散和削弱了革命政黨的戰鬥力。這使當時孫中山在軍事上迭遭失敗的同時，又面臨著另一個大的困難。它對孫中山和同盟會都是一個考驗。孫中山經受了考驗。他在這極端困難的時期，並沒有被罵倒，被嚇怕，依然毫不灰心，仍是孜孜不倦地策劃籌款和再次起義的革命工作。他認為最艱難困苦時代，就是要努力進取的時代，並大度地表示當前「胡氛黑暗，黨內有哄」之時，既是「艱危困苦之時代」，也是「吾人當努力進取之時代」，只要「毅力不屈，奮勇向前，支撐得過此厄運，則以後必有反動之佳境來也」。¹¹⁴孫中山愈挫愈奮，勇猛向前，他的這種堅強鬥爭意志和革命樂觀主義精神，是非常難能可貴的。歷史發展的事實證明，孫中山的確是在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考驗之後，才贏來了革命的勝利和共和來臨的「佳境」。

113 劉雲波：《孫中山與同盟會上層的分歧》，《社會科學戰線》，二〇〇一年第一期。

114 《孫中山致吳稚暉函》，胡漢民編《總理全集》，上海民智書局一九三〇年版，第六十六—六十七頁。